



世纪前沿

The Communitarian Persuasion

[美]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 著

Philip Selznick

马洪 李清伟 译 李清伟 校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

[美]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 著 马洪 李清伟 译 李清伟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美)塞尔兹尼克(Selznick, P.)
著;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he Communitarian Persuasion
ISBN 978-7-208-08415-5

I. 社… II. ①塞…②马…③李… III. 政治哲学-西方
国家-现代 IV. D09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327 号

责任编辑 张玲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

[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 著

马洪 李清伟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4
字 数 150,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15-5/B·709
定 价 22.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序 言

在令人信服地思考政治和政府时，我们都可以求助于一些方法，不管读者经历如何，本书都将提供这种方法。它是针对那些有创见、有修养而又繁忙的公众的。阅读本书并不费时。它篇幅不长，却分量不轻。本书由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之一所著，它以精巧和谦恭的方式，提出了所有的根本理念和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是一个宏大而又多面向的问题之令人满意的解决所必需的，正如作者所言的“面对现代性”问题。^[1]

这并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著作，只有这部著作才值得褒扬。当爱因斯坦建议科学写作者“尽可能简化，但不要过于简单”时，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懂得他用意何在。我们关于公众及其问题的对话充满了半真半假的错误选择，这些对话总是以伟大理想的名义提出。我们会感觉到拒绝的迫切需要——但是如何恰如其分地拒绝呢？我们需要比较好的批判，这是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所必需的，它要求一种比我们通常所能得到的观点更高明的观点。我们知道，划分半真半假与天马行空般的理想之间的差别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正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保护我们弄不懂的理念”，为了恰当地理解它们，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政治经验的基础。我们必须整体地、联系地看待事物。

这种需要产生了一种对符合时代要求的公共哲学的探索，随之而来的是塞尔兹尼克为这一进程所需要的工具贡献了一些基本的要件——部分地图、部分检测仪和当下复杂的社会地理的定位系统。公共哲学不是什么纯粹的事物。它包含着太多的信息。正是理念和价值的内在框架为我们的政治提供了智识基础。像其他基础一样，我们可能视其为

理所当然，并忽略为保持其真正地持续使用而进行的投资。由于忽略太多，我们的公共事务变得拥挤不堪。我们有这种感觉，政治生活自身正在陷入泥潭。公众充满了麻木思想和集体虚弱感。因此，问题似乎迫在眉睫。

美国的公共哲学自产生以来就是广义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种遗产也有其复杂性、含糊性和矛盾性，不过，它是我们最高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最直接的渊源。正如塞尔兹尼克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传统，而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一个假设和结论严密的体系”。其发展一向不是和平的、有序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尤其如此。从一开始，美国政治中最尖锐的冲突不是发生在自由主义者和那些信奉其他传统的人之间，诸如保守党模式中的保守主义的家长作风，而是发生在强调自由主义传统自身的不同派别之间，正如许多学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样。

我们的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严格意义上说，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学术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此，“古典的”是指17世纪的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约翰·洛克(John Locke)首创的观点的持久活力，也指其他反对君主制、等级规则、政教合一等旧秩序的主张和传统的市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作为保守主义者，他们致力于有限的和最小化的政府，越是地方化越好。他们忠于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他们深信，如果让其自我运转而不采用“政府干预”的话，市民社会的自然动力学是良性的，不太容易腐败和不正义。当处于压力并需要首要原则时，当代保守主义的好奇心在于追求更现代的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念，以及纯粹和简单。

这些理念在技术意义上并不必然更纯粹、更简单，因为即使最具因果关系的学院派的新经济学理论或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会掩饰这一观念。在它们没有受到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限制时，它们更加纯粹和简单，这些社会和道德限制则被先驱们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是现代文化中存在对政府功能的一种相当僵硬的、单向度的透视，只有勉强

的可能性，缺少明晰的良知来确保政府计划和政策的合法性，而这自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随之而来的伟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以来就已经付诸实施了。有关当今“大政府”基本合法性的这些怀疑，借助于私有化和分权的合并理念，作为在新千年中治愈政府弊端的有效救济措施得以表达。

如果我们的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种，那么我们那些自诩的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我们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他们往往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焦虑，导致本书的出版，并为塞尔兹尼克的质询提供了起点。由于保守主义者数十年来一直强烈抨击政府，自由主义者已经对所能做的一切作了回应，特别是提出市场倾向于无序，市场在类型上与政府机构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们在性质上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替代。但是，在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回到首要原则时，他们转向何处呢？在塞尔兹尼克看来，他们越来越转向非常没有根基的、关于现代权利的性质和保证权利实现的国家特征的断言。当这样做时，他们忽略了思考政府的恰当功能的早期方式。结果，他们弄不清权利和义务的联系，因而在思考政策与治理时随波逐流。

塞尔兹尼克的著作描述了旧方式和新方式之间的冲突。他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和它所引发的社会和道德学说写起。他是实用主义在战后取得最重要成就的创造者。尽管他一直支持实用主义传统，但是其他人从他的思想中所接受的新的兴趣，是美国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持续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从实用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优点出发，塞尔兹尼克得出结论说，现在的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思潮问题深重，已经在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要求方面失去了影响力和责任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式上所赋予的福利自由主义需要基本的矫正，正如保守主义思潮一样。在这一点上，至少两种哲学共享的东西比他们分野的东西更重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那些善于思考的批评家们凭经验能够看出的、在自由主义传统中作为主流的、循环发生的弱点——一种缺失，一种由于缺乏可靠理论和责任伦理的缺失。

这是本书着意解决的核心问题。塞尔兹尼克相信现代自由主义最负责任的形式是他所称的“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communitarian liberalism)。它在形式上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福利自由主义近几十年所指的思想。塞尔兹尼克与福利自由主义之争不是关于现代政府是否应当是大政府和积极的政府的问题。他知道政府一定是这样。他一向坚持有限政府不必是最小的政府。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转型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的法》(*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Towards Responsive Law*)于1978年出版,当时正值政府遭受多方危机的顶峰,这种危机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部著作树立了同情地理解政府面对紧急需求时法理学的基本框架。

塞尔兹尼克与福利自由主义之争事关某些微妙和根本的问题。它关注当代自由主义的智识基础,由于新思想的影响没有实用主义的根基,塞尔兹尼克相信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靠了,实用主义几十年来一直占据学术的主流。在这里,主要的目标是更为不同的、相当复杂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自由主义。它们在政治哲学和法学中的影响,以涉及实用主义道德理论和社会分析的这些理想观点为沉重代价。它们一起支持“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rights-centered liberalism)的公式,该公式未能充分地讨论义务或一个正当的政府的理论基础,即认为不管政府如何大、如何积极主动,在文化的道德冲突上政府一定是中立的,政府一定不参与改变道德秩序。尽管思想家不想这样(事实上,思想家会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饱受攻击的个人自治的价值方面,他们的著作在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已经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作出了贡献。这些是阻碍政治寻求社会正义和共同的善的智识的脆弱性表现。

这就是福利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全部内容,塞尔兹尼克最终站在社群主义一边。与德沃金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相比,他更喜欢约

翰·杜威(John Dewey)的政治哲学。因而,他寻求修正福利自由主义的现状,而不是根除引发战后政府的历史成就。其目的是重建有秩序的自由,重建个人需求和共同体需求之间更好的平衡,以便它们可能共同繁荣。塞尔兹尼克选择“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标签以使自由主义传统的理想清晰,而不是站在共同体理想的对立面。相反,它们的命运相互纠缠。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是他几十年来参加社会科学前沿研究的成果,是关于我们现代社会结构的性质的一个折射,是关于持续强调和毁损这种结构的文化变迁的一个反映(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变迁,而不管它们的破坏面),是关于必须保留什么以恢复弹性的一个反映。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原材料注定是互负义务的,这种义务自然地产生于我们对他人的生活的基本物质的依赖。他们的就绪在家庭、学校、教堂和工作生活的常规中呈现具体的形态。渐渐地,它变成了责任感——道义感,如果你喜欢,我们通过它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履行我们的忠诚。它不是一个持续或简单的感觉。道义感可能被误解、被误导并被滥用。在社会学意义上说,责任感变迁回应人们思考的方式和评价它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加起来成为一种改变文化的道德环境的微妙进程。塞尔兹尼克把责任说成是“共同体的精神组织”(the psychic tissue of community),他的著作是其意义和影响的拓展性深思,是对个人、社会和制度等不同向度的解释。因为与大多数其他社会和政治学作家相比,塞尔兹尼克以一种持续的、聚焦式的方式思考了责任,《社群主义的说服力》值得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杜威、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其他改变我们对公共哲学理解的思想者的著作一起,被摆放在书架上。

社群主义和进步传统

爱尔兰谚语云：“一个人的传统是他所具有的、比他更为古老的那部分。”这种看待传统的方式抓住了这一点，即任何传统，实际上，在它被活着的人享有的程度上都是活的。他们有能力为这一公式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吗，有说服力比它们本身更重要吗？如果不能，他们如何才能，或者其他如何试图依赖它来生存？我们与之斗争旨在确保它们适应当下的需要，修正需要修正的东西，提出已经有、但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东西，还有从来都不放弃已经存在的，并对遗产的完整性至为重要的东西。在此，责任感在起作用。传统涉及并制约生活的大问题。我们不当止于最常见、最令人担忧的弱点，如诗人辛波斯卡(Szyborska)所称的“因对大问题作出小回答而道歉”。

在《社群主义的说服力》中，塞尔兹尼克不是在写历史。他在讨论如何使当下有意义，在此，他对共同体生活蕴含的现代性的大问题提出自己负责任的回答。他承认与他相联系的社群主义运动没有提出特别新颖的主张，的确存在一股复古运动的气息，有回归到比福利自由主义更为古老也更好的方式，有更接近普通人经验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的类型，不是相对主义和自我断言的大杂烩，保守主义者通常这样称呼它。它有自己的正当理由，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它有自己的恰当理由，这些都来自于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思想。

换句话说，存在着比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更为深刻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关于共同体和政府的性质的一个思想库的智识渊源，共同体和政府的性质赋予漫长的进步时代的公共哲学以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个进步时代从19世纪后期延伸到新政时期。塞尔兹尼克非常了解这一智识渊源，并在本书的开篇章节赞成当下社群主义的走向，包括早期的“新

自由主义”(new liberal)。过去新自由主义中一个“新”的智识支持是其社群主义转向,以及该转向所依赖的推理。新自由主义兴起于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当时自然权利学说的激进的个人主义偏见的批评。社会理论进步模式中的新自由主义者试图不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正如塞尔兹尼克所说,他们希望回应当下过度的自由主义,并修正它们,以便使它们适应新的环境。〔2〕

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由早期社会科学的领袖提出的,当时它正从美国内战前的道德哲学中浮现出来,并呈现出研究领域和著述领域分离的特性。自由主义传统从内部迈向现代化,以回应旨在解决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苦难而势头强劲的社会运动。这些问题经由社会实证主义的新形势而产生,由政府官僚和私人机构所设计,并由它们评估、监督并向它们报告。通过与妇女和劳动改革者之间的联合,新自由主义者寻求对家庭和工作阶层共同体的新型保护。最重要的调查线索以及与现代性代价的早期遭遇引发的争论,在历史学家看来,是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是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也是涉及社会学和法学的“社会学法理学”探索。

新自由主义者先驱的长廊既宏大又多样。如果仅提及对这一遗产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则包括这样一些人物:

亨利·C. 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 莱斯特·F. 沃德(Lester F. Ward), 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 卡罗尔·D. 赖特(Carrol D. Wright), 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E. A. 罗斯(E. A. Ross), 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简·亚当斯(Jane Addams), 玛丽·帕克·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 E. R. A. 塞利格曼(E. R. A. Seligman), 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 查尔斯·梅利姆(Charles Merriam),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 Rev. 约翰·A. 瑞安(Rev. John A. Ryan), W. E. B. 杜

波依斯(W. E. B. DuBois), 赫伯特·克罗利, 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杜威。

尽管这些人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承认通过社会科学和哲学寻求社会正义。他们都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们都关注如果我们要富有成效地思考社会问题, 就需要“制度性思考”(think institutionally)。他们都相信现代政府所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处理竞争的需要, 从那些破坏共同的善的东西中挑选出合意的形式, 找到确保其社会福利的方式而不至于屈从寡头、支配、共同体联系的弱化等内在趋势。[3]

新自由主义者在现代性的混合祈祷中游弋, 他们寻求政府以确保结果, 虽然不是排他地但也沒有任何犹豫。在动态的、不可预测的、激烈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 政府是调整“竞争的道德水平”的唯一希望, 如亨利·C. 亚当斯在新自由主义传统发端时所言。[4] 遵守这一责任需要设计新的知识机构、政府的新能力、法律和规则的新理论, 它们将有助于监督和协调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所涉及的平衡。现代企业的理解和控制是第一要务, 正如通过官僚制度理解和控制公共权威一样。

人类追求的理想不是过于庞大的政府, 即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意义上的大政府, 所有新自由主义者都坚持政府小到能完成任务即可。相反, 理想状态是老练的政府, 侧重实际条件和共同体需要的政府。与工业共同体的道德水准应当是什么的对话联系起来, 新自由主义政府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从外部向人民强加繁重的规则。正如杜威认识到的那样, 政府通过政治在长期的社会知识进程中合作, 在集体智慧和责任的发展与表达中提供援助。这样做, 用杜威的话说, 政府帮助现代性的“大社会”、大企业的变动世界、强有力的组织和不断的革新转化为健康的民主社会秩序的“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5]

这就是塞尔兹尼克习惯的研究传统, 对此他的贡献远远大于分享。很早以前他就精通相关哲学思潮, 与他早期的著作《道德共同体》(The

Moral Commonwealth)(1992年)一样,《社群主义的说服力》接受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与杜威相比,他更进一步把社群主义的伦理和制度方面引向焦点。自罗斯科·庞德在进步时代宣称这种研究的需要以来,塞尔兹尼克在法律社会学领域中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与菲利普·诺内特(Philippe Nonet)合著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的法》,代表了“社会学法理学”最重要的分析成果。〔6〕他的经典研究成果《行政领导:一种社会学解释》(*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1957年),把实证的社会和道德理论引入官僚制度、公共和私人领域。它把组织特性和完整性的概念发展为制度生活的最重要的关切,并提出价值解释和具体化是真正领导能力的基本向度,它与管理能力有关,但又不同于管理能力,是一种更高、更确切的能力。

与那些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联邦政府体制上建立的整个计划和政策的合法性抱有疑虑的保守主义者不同,塞尔兹尼克更倾向于接受它们,把它们作为寻求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民主秩序的合法结果——这种寻求,就事物的性质而言,永无止境。对于这些,他不是沾沾自喜,而是给我们提供关于思考他们实际上将做什么以及如何改进的新方式。他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不应解除管制,而是寻求一种较少怀疑、较少不信任的管制,以及支撑较好管制的社会原则是什么。原则上他并不反对任何分权的回应型形式,他也不认为它们的前景是万灵丹。对联邦主义作为复杂共同体的原则和政府组织的原则,他有新思考,因而他指望超越或思考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当你计算美国政府、联邦机构和各州的机构以及较小的市民组织时,整体的确非常庞大。它们在做什么?它们试图达成什么类型的复杂共同体?塞尔兹尼克对大政府和大能力是获得大美德所必须的条件这一理念并不反感。他对市场理念也无敌意,况且有许多东西值得赞扬。但是,正如他的批评解释得那样,没有知识和责任。他指出,如果要面对现代性,我们担心的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精神。《社群主义的说服力》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精神如何运转,我们必须警惕些什么。

像许多保守主义者一样，塞尔兹尼克为市民社会唱赞歌，但是他提醒我们市民社会的机构需要通过法律和规章的文明。在他的著作中，塞尔兹尼克反复回到这一理念，即我们的公共政策的目的应当支持共同体的联系。如果要繁荣，更好的制度设计形式需要那些曾经留给传统习惯的社会生活的美德和祝福的帮助。我们不应阻止制度设计的挑战。他的敌人是设置人为界限和阻止寻求共同的善的理论家。对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来说，塞尔兹尼克坚持法律、政府和社会的整合是合意的、切合实际的理想，而不是将它们分离。它寻求三者的协作。目的在于管理回应型的、不屈服于政治冲突的机构，即塞尔兹尼克所称的分享与自我矫正的治理。

社群主义者的自由主义与宗教

这是复杂和困难的工作，需要力尽所能获得所有帮助。塞尔兹尼克特别寻求补救的共同体联系之一，是连接社群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和宗教共同体生活与经验之间的联系。在此，塞尔兹尼克也超越了杜威，并击败了杜威自然主义的局限。在最后一章，塞尔兹尼克反思了社群主义者的理念与宗教共同体教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请我们与他一起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什么样的态度和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开始发挥作用。他的反思标志着时代精神的某种新东西在起作用。现代自由主义一向重视礼仪，塞尔兹尼克指出，新自由主义经历了很难体会虔诚益处的低潮，尤其是审慎培育的虔诚，这构成了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精神实践。

尽管杜威本人拒绝好战的无神论，但他对不好战的无神论完全接受，似乎认为无神论是智识上诚实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由于这一原因，许多现代宗教思想家对杜威都感觉不安。世纪中叶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似乎赞成杜威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期待，即现代文化中思想的持

续世俗化将导致传统宗教制度的逐渐消失。杜威的一些追随者对此感觉非常好战，并寻求促成这一天早日到来。他们把“世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看作是对宗教自然主义替代，并以此推动了反对传统宗教信仰的运动。^[7]这无益于 20 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和宗教共同体成员间的关系。

塞尔兹尼克不介入这一问题，并很快指出世俗化并没有找到许多人想得到的出路。伟大的宗教传统仍然存在，毫无疑问，未来将继续作为文化塑造、特性形构的机构。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很久以来，对过激的拓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并离开它去构建意识形态，塞尔兹尼克始终表示怀疑。他对杜威哲学的主要批评是其未能认真对待人类生活更黑暗、更危险的一面。他是宗教存在主义者，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他们的著述为杜威单调的见解提供了一种矫正。

赞成社群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有多种好理由，许多理由都手到擒来，但是赞成社群主义道德性的最终理由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应当尊敬道德平等原则？宗教共同体一向坚持第一位的责任是对上帝的责任。正如塞尔兹尼克指出的那样，所有伟大的宗教传统，包括儒教和印度教，都会找到不受限制的个体主义的不连贯的东西，甚至是可恶的东西，由于这一原因，它们成为历史上社群主义道德的主要来源。大恶和小恶都是在上帝的名义下所为，但是从这一洞见中我们得出了什么教训呢？从伟大传统的内部观察，宗教生活的理想是服从上帝统治的自我。在这里自治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塞尔兹尼克观察到，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追求是“可持续的自我检查，它渗透着有限的、脆弱的人性和某种超越时空的尊敬、敬畏、崇拜的领域之间联系或可能的联系这一信仰”。塞尔兹尼克提出，宗教保持其诉求和正当理由，因为它们培育自省、自我超越、忠诚和谦恭”。

这些都是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繁荣的基本要求，是经验上要确保的东西，也是值得敬仰关注的思想。塞尔兹尼克提出，在后现代的文化

生活中，一种新的泛基督教时代已经到来，它将超越教会之间的对话，把世俗哲学及其追随者也包括进来。它们共享道德原则的经验和评价的旨趣，且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塞尔兹尼克关于社会、礼仪和虔诚之间道德秩序的双重基础的相互依赖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即，“离开信条的礼仪是赤裸裸的，它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靠什么生存；离开礼仪的虔诚既没有任何价值，也无法控制”。

迈克尔·J·莱西

注 释：

[1] 有关解说塞尔兹尼克思想和影响的学术论文集，参见 Robert A. Kagan, Martin Krygier, and Kenneth Winston, eds., *Legality and Community: On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Philip Selznick* (Berkeley, Calif.: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erkeley Public Policy Press, 2002)。在这个论文集中，我的文章“Taking Ideals Seriously: Philip Selznick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思考了塞尔兹尼克的社会学道德哲学方法与旧的作为政治学和道德框架的自然法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2] 有关政府和文化中的新自由主义的渊源、内容和影响的讨论，参见 Mary O. Furner, “Policy Knowledge: The New Lib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2001)。特别注意开篇关于知识的增长与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Social Investigation,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State: An Introduction” (pp. 3—60), and Furner,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and the New Liberalism: Social Investigation, State Building and Social Learning in the Gilded Age” (pp. 171—241)中的章节。她的另一篇文章审视了行动中的新自由主义关于进步时代、劳动权等的观点。参见“Knowing Capitalism: Public Investigation and the Labor Question in the Long Progressive Era,”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Knowledge: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 edited by Mary O. Furner and Barry Supple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1—286。尽管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的历史并不存在，但是在 Daniel T. Ro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勾勒了进步时代相互交流的大西洋彼岸改革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学的轮廓。在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探明了很多理论家的著作。Eisenach,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是进步时代的思想与现代个人权利和公民责任、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步思想中的宗教思潮的争论的持续相关性的一个说明。

[3] 关于界定美国公共哲学史上反对派范式的“制度性思考”的集中讨论，参见 Michael J. Lacey, “Federalism and National Plann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gacy,” in *The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Culture and Policy*, edited by Robert Fishman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9—145。

[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竞争和社会道德的思潮及其前景的经典界说，参见 Joseph Dorfman, ed., *Relation of the State to Industrial Action and*